

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高春雷

[摘要] 本文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夫妻家庭内部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妻子家庭谈判能力从无或者很弱到有(可以在家庭决策中与丈夫共同商量)再到较强(在家庭决策中可以独自说了算)的过程中,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概率也随之提高。与丈夫获取更高家庭谈判能力相比,妻子谈判能力更高的家庭,其子女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书桌、享有自己的房间、获得更多数量的课外书和面临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夫妻双方家庭谈判能力相当时,其子女拥有自己书桌、房间和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将显著增加,子女没有课外书和拥有1—5本课外书的概率将显著减少,而子女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则将显著增加。改善女性家庭谈判能力对于促进子女教育、特别是促进教育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三个方面可以改进:要加强女性教育投入,可以通过全日制、在岗培训、夜大学、岗前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已婚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通过多渠道促进女性就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具有女性倾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

[关键词] 家庭谈判能力;教育;人力资本投资

自20世纪60年代Becker对家庭消费需求的新古典模型进行扩展,将“时间”作为限制条件进行经济分析以来,一系列有关家庭行为的经济模型相继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福利水平除了受到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外,还与人们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有关,比如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之后,基于决策自主权和选择权的视角,各领域学者开始探讨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权利及其影响效应,其中,关注较多的就是家庭资源配置产生的代际影响,如家庭资源配置对婴幼儿存活、子女的健康、子

[收稿日期] 2021-12-26

[基金项目]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校级科研课题项目“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首都职工职业流动问题研究”(2020-GHGY-BK03)。

[作者简介] 高春雷,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gcl8716@163.com。

女的教育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有的学者更是直接关注家庭作出资源配置决策的具体过程,将这个过程中各家庭成员的权力制衡作为代际福利效应的一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随着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核心家庭的显著增加,中国的家庭关系已经逐渐从传统意义上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向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转变。而家庭权力结构的蜕变直接影响着家庭内部决策体系,其中特别显著的就是有关养育后代子女的决策问题不再受祖父母辈过多的参与和干涉,作为父母亲的夫妻拥有了对子女各方面事项,包括教育等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绝对决策权。立足中国家庭结构变更的背景,在家庭内部决策氛围发生转变的情况下,考虑家庭谈判机制对子女福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夫妻各自家庭谈判能力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以期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一些实质性的结论和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对以往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总结,为后续指标的选取、实证模型的建立奠定一定的理论和经验基础;第二部分是基本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来源的说明;第三部分在对样本数据进行简单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基本假设;第四部分则基于实证模型通过 Stata 计量软件得出相应的实证结果;文章最后对实证分析进行总结,并提出改善女性家庭谈判能力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学者们针对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健康、教育及童工现象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结论不尽相同,并未得出较为一致的意见。一些学者认为家庭决策中女性占据优势地位对其子女更有利,例如,Thomas(1990)通过使用巴西家庭营养数据发现,母亲控制家庭非劳动收入(unearned income)对孩子生存的影响效应比父亲控制家庭非劳动收入多 20 倍。Smith 等(2003)探讨了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三个发展中地区的妇女地位与儿童营养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女性地位对儿童的营养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chmidt(2012)使用集体家庭谈判模型(collective model of household bargaining)探究了女性决策权力与孩子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与 Smith 等基本一致的结果,指出女性在家庭,尤其在大型购物方面享有决策权时,其孩子拥有更高的年龄别身高 Z 评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些母亲参与家庭大型购物决策的孩子的年龄别身高 Z 评分要比那些母亲未参与家庭大型购物决策的孩子平均高出 0.118 个标

准差。Quisumbing等(2000)、Behrman和Skoufias(2006)的研究均表明,女性控制资产对下一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比如妻子持有资产对家庭支出中儿童服装和教育方面所占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lick和Sahn(1998)、Ray(2000)和Ersado(2005)等学者的研究均指出,母亲谈判能力(分别通过教育、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等方面指标进行测量)与子女的教育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由母亲管理或领导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更长。Gitter和Barham(2008)通过尼加拉瓜数据发现,当女性在家庭中拥有较多权力时,会将更多的家庭资源分配至子女身上。然而,其研究也指出女性并非拥有越多家庭权力越好,当其权力显著高于男性权力时,会降低儿童,特别是女孩的入学率。Reggio(2010)提出当妻子谈判能力达到最大值时,中等层次家庭女童工现象会明显减少,其周工作时间将减少到16小时或减少55%的幅度。

同时,有学者提出丈夫对子女影响更大一些。例如,Jerrim和Micklewright(2011)使用200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30个国家15岁青少年及其父母的相关数据,将子女在数学、科学和阅读测试中表现出的认知能力与其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联系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只关注了生父母健全的子女样本)。其数学测试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往往与子女成就之间具有更强关联性,在儿子样本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支持女性拥有家庭谈判能力更有利,还是认为男性取得家庭谈判能力更有利的学者,都进一步研究了对子女影响的性别差异,认为夫妻各自在家庭中取得决策权对儿子和女儿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Thomas(1990)指出父母对子女的健康状况偏好呈现性别差异,母亲往往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女儿以改善其健康状况,而父亲则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儿子。Quisumbing和Maluccio(2000)使用发展中国家家庭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父母对儿子和女儿教育投资持不同偏好。Lorraine等(1997)、Guido和Riphahn(2007)、Jerrim和Micklewright(2011)指出,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儿子影响更大,而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女儿能力的影响强于对儿子能力的影响。

在众多学者针对谁在家庭中取得话语权对子女更有好处进行争论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倡家庭谈判能力的平衡,认为无论家庭谈判权倾向于夫妻哪一方,都有可能产生不利于子女成长的结果,例如童工现象。Basu(2006)利用尼泊尔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当家庭权力平衡时,童工数量最少;而当父母中一方拥有更强大权力时,童工会增加。类似地,Sakamoto(2006)使用来自印度的数据证明,父亲拥有更多权力时,儿童更容易成为童工。与此相反,Reggio(2010)利用墨西哥家庭生活调查(Mexican Family Life Survey,

MxFLS)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决策权和童工特别是女童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妻子谈判能力的增加,女儿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但并未显现与儿子工作时间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关注家庭决策情况对子女影响的文献和证据已经有很多,且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取得决策权和更好的地位对子女福利更有利,然而福利往往更多地停留在儿童或者幼儿的健康层次上。虽然也有涉及教育,但往往只是以某一次的学习成绩或者总体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结论缺少一定的稳健性或者未能剖析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教育各方面的实际影响程度和路径,考虑到这一点,还需投入更多努力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本文采用 Stata14.0,使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客观数据出发,进行 probit 和 mlogit 模型估计,探讨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二、基本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基于 probit 和 mlogit 的实证模型估计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子女人力资本投资($hcinvest$),解释变量为夫妻家庭谈判能力(bp),建立如下所示的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实证模型并进行 probit 模型估计:

$$hcinvest_i = \beta_1 bp + \beta_2 MO_i + \beta_3 FA_i + \beta_4 CHID_i + e, i = 1, 2, \dots, n$$

其中, $hcinvest_i$ 表示第*i*个样本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bp 表示夫妻家庭谈判能力; MO 、 FA 分别表示从妻子和丈夫方面出发的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CHID$ 表示子女方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子女自身的人口学特征以及子女所面临的一些学校等环境方面的因素,放入模型中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性; e 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抽样调查法进行问卷数据的收集,回收18岁及以上个人有效问卷共计105573份,10—17岁儿童有效问卷共计20405份。本文研究的是夫妻谈判能力对青少年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因此,将研究样本设定在10—17岁(周岁)、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下、父母健在且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子女样本。通过对解释变量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和控制变量夫妻受教育程度等指标数值均

缺失的样本进行剔除,经过对样本的初步处理,最终样本量为5717个。其中,农村样本占比59.26%;城镇样本占比40.74%。小学样本为1990个,占比34.81%;初中样本为2488个,占比43.52%;高中样本为1239个,占比21.67%。男孩样本为3060个,占比53.52%;女孩样本为2657个,占比46.48%。

(三)变量设置

本文从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等几个维度进行指标的选取和设置,具体指标的说明和赋值标准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1. 被解释变量的设置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细分为4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包括子女是否拥有自己的书桌、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和拥有课外书情况。其中,前三个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即当答案为“是”时,赋值为1;当答案为“否”时,赋值为0。拥有课外书情况则是根据拥有课外书的数量范围进行分类,分别进行0—3的赋值,具体地,当子女没有课外书时,拥有课外书情况赋值为0;当子女拥有1至5本课外书时,拥有课外书情况赋值为1;当子女拥有6至20本课外书时,拥有课外书情况赋值为2;当子女拥有20本以上的课外书时,拥有课外书情况赋值为3。由表2可知,样本中有约79.20%的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76.19%的子女拥有自己的房间;38.75%的子女参加了课外辅导;对于课外书拥有情况,则平均处于5—6本的范围(该指标均值为1.5283,即超过5本但不足6本的情况)。

2. 解释变量的设置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儿童专卷调查中有针对父母在家里决策权的问题“你觉得在家里你父母谁更能说了算?”,根据该问题及其答案,本文对解释变量夫妻家庭谈判能力进行赋值。当父亲说了算时,家庭谈判能力赋值为1;当父亲和母亲话语权相等或差不多时,家庭谈判能力赋值为2;当母亲说了算时,家庭谈判能力赋值为3。根据指标的赋值可以发现,家庭谈判能力数值越大,表明妻子家庭谈判能力越强,在家庭决策过程中拥有的话语权越大。由表2可知,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的均值为1.7847,表示样本中家庭谈判能力稍微偏向于丈夫一方。对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发现,有38.94%的家庭由丈夫做主,即丈夫的家庭谈判能力更高;有17.41%的家庭由妻子做主,即妻子更具有话语权;有43.64%的样本家庭则丈夫和妻子实权差不多,由夫妻商量决策家庭事务。从样本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家庭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男尊女卑”的传统已经被逐渐打破,夫妻家庭谈判能力趋于扭转,家庭内部的两性地位在逐步实现平等。

3. 控制变量的设置

为了有效控制其他有可能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因素, 本文在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 较准确地把握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具体影响程度。特别地, 本文从三个方面出发对控制变量进行设置, 分别为与父母相关的控制变量、子女人口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子女学习环境的控制变量等。前者包括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和母亲收入、父亲和母亲是否在业等; 子女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子女的性别、年龄及年龄平方; 后者包括兄弟姐妹数量(不包括子女本人)、是否和父亲及母亲一起生活以及是否就读重点学校。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篇幅有限, 不再赘述。

表1 变量说明与赋值

变量	赋值标准	变量	赋值标准
是否拥有个人书桌	1=是; 0=否		受教育年限, 0=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6=小学;
是否拥有个人房间	1=是; 0=否	母亲受教育程度	9=初中; 12=高中/中专/中技; 15=大学专科; 16=大学本科; 19=研究生
拥有课外书情况	0=没有; 1=1-5本; 2=6-20本; 3=20本以上		
是否参加课外辅导	1=是; 0=否	父亲受教育程度	同上
家庭谈判能力	1=丈夫在家里说了算; 2=夫妻共同商量; 3=妻子在家里说了算		包括 A. 劳动收入(含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经营性收入和农林牧渔收入等); B. 房屋、土地、车辆等租赁收入; C. 其他财产性收入(股票/债券/基金收益、利息等); D. 离退休金/养老金及相关补贴等; E. 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三农补贴等; F. 其他(家庭成员供养、亲友资助等)。
性别	1=男; 0=女		
年龄	调查年份减出生年份		
兄弟姐妹数量	不包括子女本人	父亲个人收入	
是否与父亲长期同住	1=是; 0=否		
是否与母亲长期同住	1=是; 0=否		
是否就读重点学校	1=是; 0=否		
父亲是否在业	1=是; 0=否		
母亲是否在业	1=是; 0=否	母亲个人收入	同上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拥有个人书桌	5715	0.7920	0.4059	0	1
是否拥有个人房间	5715	0.7619	0.4260	0	1
拥有课外书情况	5686	1.5283	0.9435	0	3
是否参加课外辅导	5407	0.3875	0.4872	0	1
家庭谈判能力	5717	1.7847	0.7193	1	3
母亲受教育程度	5717	8.8086	3.7916	0	19
父亲受教育程度	5717	9.6586	3.2934	0	19
父亲个人收入	5327	20353.0500	51186.8800	0	3000000
母亲个人收入	5327	10755.8900	15818.2000	0	250000
父亲是否在业	5717	0.9038	0.2949	0	1
母亲是否在业	5717	0.7591	0.4276	0	1
性别	5717	0.5352	0.4988	0	1
年龄	5717	13.3512	2.2048	10	18
兄弟姐妹数量	5714	0.8721	0.9913	0	7
是否与父亲长期同住	5866	0.9143	0.2800	0	1
是否与母亲长期同住	5866	0.9504	0.2172	0	1
是否就读重点学校	5403	0.2774	0.4478	0	1
城乡	5714	0.4074	0.4914	0	1

三、基本假设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将被解释变量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与解释变量夫妻家庭谈判能力联系起来进行简单的统计对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总体而言，随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的增加，即妻子的家庭内部谈判能力较强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呈现增加的趋势；夫妻家庭谈判能力=2和夫妻家庭谈判能力=3时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个维度的指标均值都大于妻子家庭谈判能力最弱时候(夫妻家庭谈判能力=1)的情况。例如，当夫妻家庭谈判能力=2和夫妻家庭谈判能力=3时，是否拥有个人书桌的均值分别为0.8240和0.8458，均大于夫妻家庭谈判能力=1时该变量的均值水平，相差幅度分别为12.52%和15.50%。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四个维度均反映出家庭谈

判能力倾向于女性或者妻子在家庭中地位更高、更能取得决策权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更高。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是否拥有个人房间外，其他三个变量都是在夫妻家庭谈判能力=3时取得最大均值。因此，可以提出一个基本假设：女性家庭谈判能力越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对子女越有利。

表3 夫妻家庭谈判能力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统计对比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谈判能力
是否拥有个人书桌	2204	0.7323	0.4429	1
	2471	0.8240	0.3809	2
	986	0.8458	0.3613	3
是否拥有个人房间	2204	0.7205	0.4489	1
	2471	0.7920	0.4060	2
	986	0.7900	0.4075	3
拥有课外书情况	2194	1.3564	0.9232	1
	2460	1.6191	0.9412	2
	979	1.6956	0.9319	3
是否参加课外辅导	2054	0.3228	0.4677	1
	2354	0.4252	0.4945	2
	947	0.4424	0.4969	3

四、实证结果

(一) 基于 probit 和 mlog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父母其中一方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另外一方，在夫妻各自受教育程度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这意味着如果父亲受教育程度高，则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的影响效应会变小；另一方面，母亲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出现互补的情况，如果父亲受教育状况较好，则受教育状况较好的母亲可以更有效地向其子女传递人力资本。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似乎比较缺乏。Jerrim 和 Micklewright(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之间存在着互补性，指出父母彼此间的典型互补模式表明选型配婚可以增强代际人力资本的转移力度和子女十几岁或者少年时期的认知能力。Blossfeld(2009)认为婚姻中的教育同质性(与一个受教育水平相当的人结婚)会导致个体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有利的(以及不利的)资源集合和积累起来。夫妻受教育程度互补原

理意味着这种集合和积累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效应并没有叠加起来。为了检验父母受教育程度之间的互补效应,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交叉项,以控制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相同的影响效应。另外,父母可能在向与其同性别孩子转移人力资本时表现得更为有效,即父亲往往更有效地影响儿子,而母亲则更有效地影响女儿(Jerrim 和 Micklewright, 2011)。因此,本文也在模型中加入了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性别的交叉项、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性别的交叉项。具体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家庭谈判能力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4个维度的指标之间均呈现了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从系数符号上可以看出,“夫妻共同商量”和“妻子在家里说了算”都分别与各个维度的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指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与“丈夫在家说了算”的家庭子女相比,那些在以夫妻共同商量和妻子说了算的方式进行决策的家庭生活的子女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更大一些。具体地,与丈夫家庭谈判能力较强的家庭的子女相比,在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相当和妻子家庭谈判能力较强的家庭中,其子女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书桌、房间、课外书和参加课外培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个维度下夫妻家庭谈判能力=3时系数依次为0.131、0.0629、0.299、0.429、0.544和0.130,均大于夫妻家庭谈判能力=2时的系数值(分别为0.0906、0.0647、0.159、0.256、0.309和0.097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妻子家庭谈判能力的增强,家庭谈判能力指标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影响效应增强。从P值上可以看出,在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拥有6—20本课外书、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以及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夫妻共同商量”在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除了是否拥有自己的书桌以外,其他三个维度下的系数显著性水平均为5%);在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拥有1—5本课外书、拥有6—20本课外书、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以及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妻子说了算”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在拥有课外书情况=2和拥有课外书情况=3维度下的系数显著性水平均为1%)。这说明与“丈夫说了算”相比,“夫妻共同商量”和“妻子说了算”对子女获得书桌、课外书以及课外辅导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影响。

大部分夫妻基本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都显现出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显著性影响。其中,妻子受教育程度、丈夫受教育程度、妻子个人收入和丈夫个人收入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个维度的变量基本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夫妻各自受教育程度越高、各自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子女取得更高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越高。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的指标的正向影响都具有显著性。其中,与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拥有自己的房间和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3个维度下的子女人力资

本投资指标之间的正相关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子女拥有1—5本和6—20本课外书、参加课外辅导之间的正相关性也表现为5%的显著性水平;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各维度人力资本投资指标均具有正向影响,除了在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外,其他都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见,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妻子是否在业和丈夫是否在业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指标的影响上显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地,丈夫是否在业分别与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拥有自己的房间以及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显著性水平均在5%以上;妻子是否在业仅与子女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结合夫妻各自个人收入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夫妻各自的在业状态决定了各自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两者对子女的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同时,在一系列交叉项方面,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的交叉项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个维度的指标所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在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拥有自己的房间和参加课外培训三个维度下的系数值为正,其中后两者显现出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这表明在是否应该为子女提供书桌、房间和课外培训三个方面的决策上,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具有互补效应,即随着夫妻其中一方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另一方对增加子女书桌、房间和课外辅导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会变大。而在子女拥有课外书的三个维度下,夫妻受教育程度交叉项的系数均为负,其中在子女拥有1—5本课外书的维度下呈现10%的显著性,表明在为子女提供一定数量课外书方面,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即随着夫妻其中一方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另一方对增加子女课外书的影响效应会变小。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下,丈夫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系数基本都为正,这意味着给定丈夫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儿子获得自己书桌、房间、课外书和课外辅导的概率更高,与以往很多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表明丈夫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更偏好于儿子,但该交叉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妻子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在不同维度下的系数方向呈现差异,在子女是否拥有自己的书桌、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和拥有1—5本课外书维度下,其系数为负,意味着,在给定妻子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女儿获得自己书桌、房间、1—5本课外书的概率更高;在子女拥有6—20本课外书、20本以上课外书和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的系数都为正,表示给定妻子受教育水平,儿子更有可能获得6—20本课外书、20本以上课外书以及参加课外辅导。与丈夫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基本类似,妻子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

的交叉项在大部分维度下均未显现显著性,然而与丈夫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影响效应相比较而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夫妻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性别偏好。

子女人口学特征及其学业环境方面的控制变量也分别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指标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由表4所示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子女性别在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维度下显现出在5%水平上的正向显著性,表明与女儿相比,儿子拥有自己房间的可能性明显更大一些;在拥有课外书情况=2和拥有课外书情况=3两个维度下,子女性别指标都分别呈现出在10%和5%水平上的负向显著性,表明与女儿相比,儿子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明显更大一些。在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指标下,子女年龄的系数均为正,而且除了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外,其他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子女获得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显著增加。子女兄弟姐妹数量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指标下的系数值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兄弟姐妹越多,子女获取更高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越小。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拥有兄弟姐妹的子女在其父母投入子女教育的资源分配中往往不可能获取相等的份额。模型结果还显示,与农村家庭的子女相比,城镇家庭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更高一些。

表4 基于probit和m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拥有个人书桌	是否拥有个人房间	拥有课外书情况(以没有课外书为基准组)			是否参加课外辅导
			拥有1—5本课外书	拥有6—20本课外书	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	
夫妻共同商量	0.0906* (0.0478)	0.0647 (0.0446)	0.159 (0.0997)	0.256** (0.108)	0.309** (0.125)	0.0976** (0.0425)
妻子在家里说了算	0.131** (0.0663)	0.0629 (0.0602)	0.299** (0.145)	0.429*** (0.154)	0.544*** (0.172)	0.130** (0.0555)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515*** (0.0122)	0.0414*** (0.0106)	0.0590** (0.0242)	0.0594** (0.0264)	0.114*** (0.0333)	0.0256** (0.0106)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329** (0.0143)	0.0268** (0.0126)	0.0745*** (0.0283)	0.115*** (0.0314)	0.144*** (0.0380)	0.000901 (0.0123)
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的交叉项	0.0110 (0.00832)	0.0108** (0.00545)	-0.0283* (0.0165)	-0.0272 (0.0168)	-0.0126 (0.0178)	0.0170*** (0.00420)
丈夫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	0.0753 (0.0510)	0.0143 (0.0408)	0.0825 (0.110)	0.0918 (0.114)	0.0690 (0.120)	-0.00124 (0.0343)

续表

变量	是否拥有 个人书桌	是否拥有 个人房间	拥有课外书情况(以没有课外书为基准组)			是否参加 课外辅导
			拥有1—5 本课外书	拥有6—20 本课外书	拥有20本以 上课外书	
妻子受教育 程度与子女 性别的交 叉项	-0.00786 (0.0497)	-0.0692* (0.0396)	-0.00629 (0.105)	0.0347 (0.109)	0.0825 (0.116)	0.0174 (0.0341)
父亲个人 收入	1.05e-05*** (1.71e-06)	6.61e-06*** (1.34e-06)	1.49e-05*** (4.22e-06)	1.99e-05*** (4.23e-06)	2.04e-05*** (4.25e-06)	8.53e-08 (3.57e-07)
母亲个人 收入	9.21e-06*** (2.75e-06)	5.27e-06** (2.15e-06)	1.18e-05* (6.83e-06)	1.98e-05*** (6.87e-06)	2.19e-05*** (6.99e-06)	2.86e-06** (1.35e-06)
父亲是否 在业	0.286*** (0.0730)	0.251*** (0.0669)	0.115 (0.159)	0.231 (0.172)	0.391** (0.198)	-0.0448 (0.0651)
母亲是否 在业	-0.00721 (0.0542)	0.154*** (0.0492)	0.0752 (0.115)	0.0745 (0.123)	-0.0310 (0.139)	-0.0481 (0.0460)
是否与父亲 长期同住	-0.0289 (0.0903)	0.0196 (0.0841)	-0.104 (0.189)	-0.0316 (0.207)	-0.00728 (0.244)	0.298*** (0.0834)
是否与母亲 长期同住	0.121 (0.113)	-0.0836 (0.109)	-0.0684 (0.232)	0.157 (0.263)	0.273 (0.327)	-0.186* (0.107)
性别	-0.180 (0.148)	0.237** (0.119)	-0.343 (0.290)	-0.558* (0.310)	-0.737** (0.354)	-0.133 (0.106)
年龄	0.485*** (0.130)	0.370*** (0.120)	1.164*** (0.269)	1.141*** (0.291)	0.961*** (0.329)	0.0403 (0.114)
年龄平方	-0.0170*** (0.00484)	-0.0105** (0.00449)	-0.0436*** (0.0100)	-0.0406*** (0.0108)	-0.0350*** (0.0122)	-0.00217 (0.00427)
兄弟姐 妹数量	-0.167*** (0.0230)	-0.128*** (0.0222)	-0.300*** (0.0455)	-0.340*** (0.0515)	-0.567*** (0.0700)	-0.0419* (0.0227)
城乡	0.391*** (0.0615)	0.0135 (0.0535)	0.570*** (0.148)	1.079*** (0.152)	1.431*** (0.167)	0.349*** (0.0484)
常数项	-3.915*** (0.878)	-3.384*** (0.804)	-7.343*** (1.813)	-9.043*** (1.962)	-9.559*** (2.226)	-1.086 (0.766)
样本量	5280	5280	5254	5254	5254	4995

注：1. 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误。2.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与此同。

(二) 边际影响效应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本文还做了进一步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与丈夫获取更高家庭谈判能力相比,夫妻双方家庭谈判能力相当时,其子女拥有自己书桌、房间和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增加1.94%、1.81%和3.74%,其中,在子女拥有自己书桌和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分别显现在10%和5%水平的显著性;子女没有课外书和拥有1—5本课外书的概率分别减少1.75%和1.77%,其中前者具有在5%水平上的显著性,而子女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则分别增加1.83%和1.69%。与丈夫获取更高家庭谈判能力相比,夫妻双方家庭谈判能力相当时,其子女拥有自己书桌、房间和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增加2.70%、1.74%和5.01%,其中,在子女拥有自己书桌和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均显现在5%水平上的显著性;子女没有课外书和拥有1—5本课外书的概率分别减少2.82%和2.54%,其中前者具有在1%水平上的显著性,而子女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则分别增加2.34%和3.02%,其中后者显现在10%水平上的显著性。通过边际效应分析可以发现,妻子家庭谈判能力强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

(三) 基于城乡视角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性特征,本文分别就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中夫妻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系数方向上来看,只有在子女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维度下,城镇家庭中夫妻共同商量和妻子说了算的系数为负数。其他维度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家庭,夫妻共同商量和妻子说了算的系数均为正,表示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镇家庭中,与丈夫说了算相比,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相当和妻子家庭谈判能力更强一些的情况下,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参加课外辅导、拥有1—5本课外书、拥有6—20本课外书以及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均会增加。具体地,与丈夫家庭谈判能力更强相比,农村家庭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相当在子女拥有自己的房间、拥有6—20本课外书和20本以上课外书维度下分别呈现显著性,而城镇家庭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相当只在子女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呈现显著性。与丈夫家庭谈判能力更强相比,除了子女参加课外辅导维度外,农村家庭妻子家庭谈判能力更强在其他维度下分别呈现显著性,而城镇家庭妻子谈判能力更强与家庭谈判能力相当一样,只在子女参加课外辅导维度下呈现显著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村和城镇家庭中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指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一致,并无太大差异。

表5 基于城乡视角的模型估计分析

变量	是否拥有个人书桌		是否拥有个人房间		是否参加课外辅导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夫妻共同商量	0.0866 (0.0540)	0.126 (0.105)	0.0946* (0.0533)	-0.0462 (0.0844)	0.0289 (0.0559)	0.187*** (0.0668)
妻子在家里说了算	0.139* (0.0772)	0.121 (0.134)	0.182** (0.0766)	-0.154 (0.102)	0.0815 (0.0772)	0.207** (0.0825)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370** (0.0166)	0.0396 (0.0297)	0.0383** (0.0151)	0.0562** (0.0232)	0.00767 (0.0155)	0.0269 (0.0199)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301 (0.0187)	-0.00318 (0.0298)	0.0300* (0.0173)	0.0291 (0.0233)	-0.0310* (0.0182)	0.0203 (0.0201)
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的交叉项	0.0357* (0.0184)	0.0160 (0.0121)	0.0123 (0.0150)	0.00269 (0.00821)	0.0314** (0.0134)	0.0132** (0.00621)
丈夫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	0.0543 (0.0682)	0.109 (0.0843)	-0.00865 (0.0642)	0.0372 (0.0584)	0.0906 (0.0631)	-0.0408 (0.0447)
妻子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性别的交叉项	-0.00536 (0.0653)	-0.0107 (0.0877)	-0.0560 (0.0623)	-0.0926 (0.0586)	0.102 (0.0624)	-0.0127 (0.0459)
父亲个人收入	1.11e-05*** (2.02e-06)	1.06e-05*** (3.44e-06)	4.70e-06*** (1.69e-06)	1.05e-05*** (2.37e-06)	-3.51e-07 (1.14e-06)	1.78e-07 (3.79e-07)
母亲个人收入	5.81e-06* (3.29e-06)	1.63e-05*** (5.61e-06)	4.52e-06 (2.97e-06)	7.71e-06** (3.32e-06)	4.70e-06** (2.35e-06)	1.73e-06 (1.75e-06)
父亲是否在业	0.326*** (0.0941)	0.224* (0.119)	0.183* (0.0936)	0.283*** (0.0970)	-0.152 (0.0972)	0.0557 (0.0882)
母亲是否在业	-0.0547 (0.0646)	0.115 (0.104)	0.112* (0.0629)	0.222*** (0.0806)	-0.165** (0.0647)	0.0863 (0.0671)
是否与父亲长期同住	-0.0793 (0.102)	0.186 (0.189)	-0.0318 (0.101)	0.110 (0.152)	0.360*** (0.111)	0.193 (0.130)
是否与母亲长期同住	0.137 (0.127)	0.0635 (0.261)	-0.0874 (0.128)	0.0535 (0.213)	-0.301** (0.134)	0.0193 (0.184)

续表

变量	是否拥有个人书桌		是否拥有个人房间		是否参加课外辅导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性别	-0.129 (0.200)	-0.317 (0.319)	0.254 (0.189)	0.247 (0.230)	-0.628*** (0.198)	0.173 (0.185)
年龄	0.442*** (0.151)	0.660** (0.264)	0.323** (0.150)	0.464** (0.204)	0.138 (0.160)	-0.131 (0.166)
年龄平方	-0.0157*** (0.00559)	-0.0230** (0.00982)	-0.00822 (0.00558)	-0.0151** (0.00761)	-0.00387 (0.00600)	0.00206 (0.00616)
兄弟姐妹数量	-0.186*** (0.0253)	-0.0781 (0.0590)	-0.126*** (0.0250)	-0.144*** (0.0495)	-0.0211 (0.0267)	-0.0966** (0.0445)
常数项	-3.572*** (1.017)	-4.633*** (1.774)	-3.031*** (1.002)	-4.125*** (1.371)	-1.532 (1.075)	0.292 (1.125)
样本量	3109	2171	3109	2171	2853	2142

(四) 基于子女不同教育层次视角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为了了解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不同教育层次的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 本文在 probit 和 mlogit 回归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子女不同教育层次进行模型估计, 以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层次的子女数据分别为样本进行了回归, 由于篇幅有限, 未在文章中显现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估计系数结果, 夫妻家庭谈判能力与不同教育层次的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 表明无论子女处于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哪一个受教育层次, 妻子在家里参与决策的程度越高, 谈判能力越强, 子女获得较高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越大, 即妻子家庭地位越高, 话语权越大, 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越有利。可以推断, 在三个受教育阶段下, 较其他两种家庭决策结构而言, 妻子拥有较强家庭谈判能力均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更大程度的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将子女是否拥有自己的书桌、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拥有课外书数量和是否参加课外辅导作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代理变量, 考察了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从以上实证结果中,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妻子谈判能力更高的家庭，其子女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书桌、享有自己的房间、获得更多数量的课外书和面临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

第二，农村和城镇家庭中夫妻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指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一致，并无太大差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家庭中，与丈夫说了算相比，夫妻家庭谈判能力相当和妻子家庭谈判能力更强一些的情况下，子女拥有自己的书桌、参加课外辅导、拥有1—5本课外书、拥有6—20本课外书以及拥有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均会增加。

第三，无论子女处于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哪一个受教育层次，妻子在家里参与决策的程度越高，谈判能力越强，子女获得较高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概率越大，即妻子家庭地位越高，话语权越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越有利。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改善女性家庭谈判能力对于促进子女教育，特别是促进教育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三个方面可以改进。

首先，要加强女性教育投入，可以通过全日制、在职培养、夜大学、岗前培训以及在岗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已婚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根据以往研究，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的衡量指标，影响着女性地位的高低，很多学者甚至直接使用受教育水平作为其中一个维度的指标对女性家庭谈判能力进行测量。由此可以看出，要提升女性家庭地位，增加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改善其受教育状况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其次，通过多渠道促进女性就业，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就业可以通过扩展女性的人生选择进而增加其话语权及更好支持家庭的能力，女性通过就业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群体和社会中。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要大力解决迫使女性分配大量时间从事家庭生产的服务性设施供应短缺问题；帮助女性积累生产性资产，如教育、资本和土地，促进她们参与到高生产率的市场活动之中；弃除那些妨碍女性享有平等就业机会、带有偏见甚至歧视性的法规或规范。

再次，增加具有女性倾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国外多项研究表明，通过对已婚女性实施政策性财政支持，可以改善儿童营养不良、入学率低下等问题，有助于子女福利水平的提升。基于此，可以增加对已婚女性的政策性补贴，如可以为那些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的已婚女性提供产检等费用的减免、为已婚就业女性提供带薪岗位培训等。

[参考文献]

- Basu, K., 2006, "Gender and Say: A Model of Household Behavior with Endogenously-determined Balance of Power", *Economic Journal*, 116(511): 558—580.
- Behrman, J. R. and E. Skoufias, 2006, "Mitigating Myths about Policy Effectiveness:

- Evaluation of Mexico's Antipoverty and Human Resource Investment Progra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6): 244—275.
- Dearden, L., S. Machin and H. Reed, 1997,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7(440): 47—66.
- Ersado, L., 2005, "Child Labor and School Decision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Nepal, Peru, and Zimbabwe", *World Development*, 33: 455—480.
- Gitter, S. R. and B. L. Barham, 2008, "Women's Power,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and Schooling in Nicaragu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2): 271—290.
- Glick, P. and D. E. Sahn, 1998, "Schooling of Girls and Boys in West Africa: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ducation, Income and Household Structur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9(1): 63—87.
- Heineck, G. and R. Riphahn, 2007,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Germany: The Last Five Decade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2985, Bonn: IZA.
- Jerrim, J. and J. Micklewright, 2011,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y and Parents' Education: Distinguishing the Impact of Mothers and Fathers", https://johnjerrim.files.wordpress.com/2013/07/jj_jm_madison_jan_26_2011_rsf.pdf.
- Quisumbing, A. R. and B. de la Briere, 2000, "Women's Asset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Rural Bangladesh: Testing Measures of Bargaining Power", *FCND Discussion Paper*, No. 86,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
- Quisumbing, A. R. and J. A. Maluccio, 2000,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and Gender Relation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CND Discussion Paper*, No. 84,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
- Ray, R., 2000, "The Determinants of Child Labour and Child Schooling in Ghana", http://www.utas.edu.au/_data/assets/pdf_file/0003/208254/2000-05.pdf.
- Reggio, I., 2010,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her's Power on Her Child's Labour in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0): 95—105.
- Sakamoto, S., 2006, "Parental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n and Child Labor: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36,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subashi University.
- Schmidt, E., 2012, "The Effect of Women's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on Child Health Outcomes in Bangladesh", *Undergraduate Economic Review*, 9(1): Article 4.
- Smith, L. C., et al., 2003,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Status for Child Nutr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Thomas, D.,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4): 635—664.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on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GAO Chun-lei

(Beiji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Cadre College)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in the third Survey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we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couple's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on their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the wife's having nothing or very weak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to having some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she can consult together with her husband in the family decision-making), and then to gaining strong one (may have the final say in family decision-making alone), the probability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also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husband having higher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families with higher wives' negotiating skill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their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desks, enjoy their own rooms, obtain a higher number of extra-curricular books and face more tutoring opportunities; When the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of both husband and wife is equal,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children owning their own desks, rooms and participating i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will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children having no extracurricular books and having 1—5 extracurricular books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l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hildren having 6—20 or more than 20 extracurricular books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women's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children's education, especially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To this end,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hat can be improved: to strengthen women's education investment,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married women through full-time, on-the-job training, night college, and pre-job training, as well as other forms; to promote women's employment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increase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rate; to increase the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with female tendencies.

Key words: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责任编辑:孟大虎 责任校对:孟大虎 刘泽云)